

费孝通 20 世纪 40 年代的国际观*

祝小楠

(安阳师范学院 思政部,河南 安阳 455000)

摘 要: 20 世纪 40 年代,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费孝通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家内政和国际环境所特有的瞩目与关切。费氏在对国家未来命运表现出深切忧虑的同时,也将目光聚焦于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之中,希望通过对以美苏为主导的国际格局的观察与分析,为陷于困境中的中国找寻一条出路。体现出当时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也为他之后社会文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 20 世纪 40 年代;费孝通;国际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695(2014)03-0030-05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的内政、外交,均面临着波谲云诡、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随着抗战的胜利结束,整合各方政治资源进而重构现代化民族国家成为时人共同的诉求与期盼。国共两党及中间派势力也无不纠缠其中,为彰显各自政治理念而往返折冲,但终因国共双方分歧过殊而未能免于同室操戈的命运。在此种动荡纷乱的时代背景下,费孝通^①(以下简称费氏)作为一名学贯中西,兼具东西方文化双重视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表现出对当时国家时局和国际政治所特有的瞩目与关切,希图为命运多舛的国家开出一剂救世良方,以挽救病入膏肓的中国。而这也体现出费氏对国家、社会、民族的深层次人文关怀。

一、理想的幻灭 ——对中美关系的反思

1943 年,费氏曾到美国学习访问一年,其间深受美国文化熏染,对美国政治经济的繁荣

倍加推崇。应该说,从 1945 年二战结束到国共内战爆发前,费氏与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美国抱有相当之期待,“美国希望一个和平,繁荣,强大的中国自然是可信的”。然而,战后美国出于对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将中国裹挟在反苏的战略之中,因而“把中国早就看成是自己圈子里的附庸国”^{[1]470}。从当时的背景看,虽然包括费氏在内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对美国充满好感,但对美国在华执行的政策也未予根本认同。究其根源在于对马歇尔的调停寄予厚望,结果却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理想的破灭,这种过山车般的心态落差自然使得自由知识分子产生一种失落感,并继而激起难以抑制的愤怒情绪,“中国问题应该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美国却把中国问题认为是它的问题了。美国既认为中国问题是美国的问题,便想依照它自己所定的方式与它自身利害的打算来解决。遂不把中国人自身的要求列入第一

* 收稿日期:2014-03-19

作者简介:祝小楠,男,安阳师范学院思政部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

^① 费孝通:生于 1910 年,18 岁时高中毕业,1933 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入清华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1936 年,经由燕大求学时的老师吴文藻推荐至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并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在 1943 年至 1944 年和 1946 年至 1947 年期间两次对美国进行了实地考察。由于二战期间美国在经济军事上帮助过中国,此时的费孝通与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美国充满好感。参见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位,甚至忽视了中国人自己所希望的真正出路”^[2]。不难发现,此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漠视中国利益的而又近乎强权政治行径明显表露出失望情绪。这也使得具有强烈危机意识和使命感的费氏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美国的对华政策。

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费氏认为美国制定在华政策的有二:

第一,在中国建立遏止苏联的前沿阵地。随着美苏冷战爆发,中国无论是地缘位置,亦或政治作用,都是美国所无法忽视的对象。一方面“把中国造成美国军事上的附庸”,并进一步“利用中国的局势来筹备反苏根据地”^{[1]359},成为美国其时最迫切的战略要求。另一方面,如何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避免其成为苏联的傀儡则是美国需要解决的另一难题。因此,扶植濒于倒台的国民政府成为美国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没有美援,中国的局面可以是一面倒的。一面倒之后,美国和苏联打交道时,在远东方面就少了一张牌。太平洋的安全美国是不肯放松的,留此中国的尴尬局面,在必要时可作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在相当程度下,美国会继续援华的。”^[3]而美国对华政策历经从战时援华抗日到战后调解国共两党纷争,再到扶蒋反共政策的出台,这种日趋反动的立场无疑消磨着费氏本人对美国较高的期望值。

第二,变中国为美国的海外市场。美国扶植国民党政府的另一目的,就是在利用中国遏制苏联的同时,希望“中国经济能早些恢复,成为美国的市场”^{[4]473}。费氏认为,这并非是一不可接受的结果,“中国要建设就得大量吸收美国资本”,借助外资以兴国家经济,而且“美国是愿意看见一个走上建设道路的中国的”^{[4]62}。从当时的环境看,中国正处于内外交迫的境地之中,前有八年抗战,后有国共纷争,国家饱经战乱,经济凋敝,社会衰败。在这种境况下,依靠自身的力量显然无法避免经济崩溃之虞。因此,要恢复国家经济,振衰起颓,借用美资未尝不是明智之举。这也是费氏主张借用美资的初衷所在。

不过,在费氏看来,美国扶蒋反共的根本主旨仍着眼于遏制苏联。“美国所怕的不是中共,而是被认为在中共背后牵线的苏联。”^{[4]199}但让

其所担忧的是,“美苏总有一天要摊牌的”,亦无论最后结果是战与和,中国都将成为“下棋打劫时割舍的代价”^[5]。针对这一局面,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天然政治情愫又使得费氏陷入自我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在主观上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中国恢复经济,进而构建现代化民主国家;另一方面,他在客观上反对美国过多干涉中国内政,希望能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前提下获得美国的帮助。而他的这一诉求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6]的主张不谋而合。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美国开始意识到国民政府倒台是迟早之事时,其立场随之转变,认为“既不宜全力以赴地支蒋,又不宜完全撤出”,而应执行一项“合理的、协调得当的、有条件的援助计划”,努力培植一个“朝着合乎美国政治观念的方向发展的政府”^{[7]150}。而合乎美国政治观念的潜在含义就是以美国自身利益为考量,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从而换取对苏联的优势。而从这一结果看,自由知识分子这一鱼与熊掌兼得的想法具有浓郁的理想化色彩。在当时情势下,这种理想而又虚幻的想法于客观层面却又是断难实现的。

马歇尔在调停失败后曾说过:“中国未来的政治寄望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无疑彰显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正如其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宣称的那样:“倘美国变更了态度,我们对于美国的任何援助都愿欢迎。换言之,我们决不是无条件的反美,亦决不是无条件的亲美。”^[8]然而,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益走形,愈发失去美国当初对华政策的本意,而当美国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已是欲罢不能,无力扭转了,“从主观愿望上,美国希望摆脱被动局面,但是总不能及时付诸行动。可以说,美国决策者的认识落后于现实,决策落后于认识,而行动又落后于决策,结果一直在重重矛盾中挣扎,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7]190}。伴随着这一转变,费氏由初期对美国的期望而逐渐失望,美国的形象开始在费氏心中层层瓦解坍塌,以至于对美国的好感消解殆尽,而美国也最终在中国归于失败。

各自的疆域限制，企图把国际格局纳入到自身的安全框架之中。因此，当两国在超越国界扩大自身安全利益时，彼此又把对方的行动视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挑衅，进而激起两国之间的敌对情绪。当然，在费氏看来，由于美国对苏联不信任所产生的敌意，带有更大程度的主观猜忌色彩，并激发了美国人想象中的恐惧，所以，“这股势力好像鬼一般的袭来，美国感觉到威胁。对内、对外，全无安全之处，拥有金元的美国竟会在繁荣中发抖”，而由此产生的威胁感在美国心中“更有着一种不敢说出来的恐惧，这恐惧是新大陆道德上将要不能再领导世界了，因为有一个更新的大陆在浓雾里闪烁出现了”^{[4]22}。正是由于对苏联崛起的恐惧，“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从这种惶惑和恐惧中决定的”^{[4]65}。而美国的这种心态变化，固然一方面是对苏联的扩张意图和行为所做出的应激性反应；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在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过程中，希图凭借强大实力遏制苏联所早已有之的企图。然而，这毕竟是美国的一己想法。在费氏看来，在以现实利益为主导的国际格局下，美苏在各自扩张战略空间的过程中，无不充斥着政治利益的碰撞，霸权的冲突，而这也构成

着独裁专制的传统”的国家，因而“这并不是说从此政府的一切设施已经全和人民的意志相合，这一点我是不敢相信的”^{[4]129-130}。

第三，美苏之间是失衡的战略格局。二战后，苏联无论从军事力量，或是从政治影响上，均有了与美国相对抗的资本，并在世界范围内同美国展开强势竞争。不过，费氏认为，表面上美苏两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但“在以力量来决定支配政治和经济范围的时代，两强在这地带所能占的范围将决定于它们相对的实力”^{[4]127}。由于“战前的苏联比了战前的美国业已相差极大”，且“这次战争对于美苏两国的经济影响又是相反”，结果造成“苏联工业被破坏”，而“美国生产力比战前提高了一倍”，因此“在目前的水准上和苏联比，没有问题的胜过好几倍”。所以在“美苏争霸的局面里，美国是处在优势，也因之，美国所采取的是攻势，而苏联是守势”^{[4]131-132}。在看到美国自身优势的同时，他也对美国所执行的战略能否保证自身安全提出了警告，“美国战线拉得这样长，而且又和无能和不受人民拥护的政府合作来进行着防苏之战，那是处于容易被攻的地位”。基于此，费孝通认为美国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是依靠自身

优势,用军事力量战胜苏联,但他对这一道路的可行性提出了疑问,即美国“是否有极端的优势,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如果没有,“美国实力一旦消耗,将来局面的演变就没有把握了”。因此,费孝通希望美国能认清形势,“在这个时候讲妥协,美国的优势还是有分量的,苏联所需求的并不能超过现有的范围的”。第二条道路则是美苏合作,走共同繁荣之路,“留出广大中间地带,作为经济复兴之用,美苏共存共荣”^{[4]137}。从这两条道路来看,费孝通无疑更偏向于后者,希望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握手言和,进而为处于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创造和平的发展环境。

40年代是美苏由战时盟国关系向两极格局蜕化的一个年代,其间涉及许多深刻而复杂的问题。美苏之间战略的控制与反控制,扩张与反扩张,渗透与反渗透,一方面说明美苏两国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两国间彼此不信任。另一方面又说明,美国对苏联崛起并进而威胁自己全球利益和自身安全始终有所戒备,因此处处提防苏联。而苏联为扩展自己的战略空间和国家利益,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美苏两国从西欧到东欧再到远东,为争夺各自战略优势互不相让,更加剧了本以动荡不已的国际格局。费孝通在对那些随时有可能成为美苏冷战的牺牲品,挣扎在美苏夹缝中的广大中间地带国家表现出深切同情与担忧的同时,对处于美苏争霸旋涡中的中国,他更是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之情,“美国在不触犯苏联的程度内会对中国政府施舍一些的,但是决不会像希土那样积极和迅速……何况一个经济崩溃了的大陆并不能增加任何一个集团的力量,只是一个累赘,不要说美国不必来救济和整理,苏联也不会有这救济和整理的能力。这个混乱的大陆上苦的反正是中国人,于美国有何相干?”^{[1]474}

三、无奈的选择 ——对欧美关系的思考

在费孝通的国际视野内,欧美关系也占据显著位置。欧洲作为二战期间的主战场,其战后又成为美苏战略利益碰撞的主要交汇点,无

论从地缘位置抑或是战略价值来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美苏都把战略重心聚焦于此,企图把欧洲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中,使之成为遏制彼此的战略工具。而战后欧洲与中国的处境有其相似性,都可视为美苏冷战间的战略牺牲品,因而也构成费孝通观察比较的基础。

其一,避免欧洲倒向苏联,保证自身战略安全,使欧洲成为重要的反苏力量。二战后,欧洲诸国遭受严重战争创伤,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单靠自身力量显然无法恢复昔日的繁荣,因此只得把目光投向美国。这又无疑赋予美国以经济手段控制欧洲的机会,来实现反苏意图。费氏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是以政治借款方式达到美国安全的目标”,即凡是接受美援的国家,必须按照美国的意志反苏。但这是否能如美国所愿,他并未看好。在其看来,如果“杜鲁门坚持着借款的政治性,这铁幕非但透不进去,反而会扩张出来”,那么“所购得的不但是欧洲人民对美国的恶感,而且反而是自己的不安全”。而美国漠视广大欧洲国家利益,企图借经济手段来绑架欧洲以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费孝通对此难以认同,“以政治借款为手段显然只能向没有出息,经济上没有出路的小国去找对象,那是一条狭小而没有前途的道路”。在他看来,用经济胁迫的手段控制欧洲不但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有可能刺激欧洲倒向苏联,使苏联趁虚而入。正如其时英国工党政府所表示的那样,“美国如以借款作政治手段,英国必然另谋其他的补救办法,不再依赖美国借款”^{[4]55-56}。

其二,扩展海外市场,繁荣国内市场,维持美国经济优势地位。费氏除指出美国的政治目的外,也同时强调其经济目的。在他看来,“这次战争把美国除外的世界打穷了”,而“这个穷困的世界只能买他80亿的货物”,“美国要维持现有的生产力,必须把这80亿的货物销出去”,否则,“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有钱买货的更少,更多的工厂要关门,这样下去就是我们常常听见的所谓‘不景气’”^{[4]54-55}。而这样的结局显然不是美国想看到的。费孝通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两个经济目的,“一是短期的,使美国过剩的生产有个出路;在大规模的援

欧计划下,美国生产将受到增进的刺激,于是更需要外国市场去消纳”,而“第二个目的,是长期的,希望这援欧计划能恢复西欧的生产力,在几年之后,成为一个有相当购买力的区域,不必长期的承受无偿救济”。因此,这两个目的不仅解决了美国自身难题,也同时扩展了海外市场,把欧洲纳入到自己的战略体系当中来。不过,费氏对美国的这一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并不看好,指出“美国复兴欧洲是名目,马歇尔的主要目的是配合外交攻势和经济守势,以维持对苏优势,等待吃去苏联的机会”^{[4]135-136},其最终的目的不过是利用欧洲充当反苏的马前卒而已。

其三,推行马歇尔计划,分裂东西欧,以此遏制苏联的战略空间。费氏对马歇尔计划可能分裂欧洲的意图相当担忧。在其看来,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不单单是为了遏制苏联,其背后也隐含着美国对欧洲作为一个整体重新崛起并进而危及自身利益的警惕性。马歇尔计划一方面“是个很巧妙的计划”,因为“西欧本是工业国,经了战争的破坏,生产力已经衰败”。如果“欧洲合成一个,东欧的农业和西欧的工业可以配合起来,成为一个强权,有如德国,这不是美国所愿造成的”,而且“它知道这个强权说不定会给苏联拖了去”的危险。^{[4]134}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义的延长”,所以“它第一个具体的结果是加深了东西欧的裂痕,这裂痕使欧洲丧失了复兴的基础”^{[4]253}。而这也是马歇尔计划所潜在的另一个目的,这样可以迫使西欧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而这也给了美国牢牢控制西欧,进一步强化反苏力量的机会。

在费孝通的视野范围下,当时美欧关系错综复杂,不仅牵涉苏联问题,而且还牵涉了欧洲各国的关系,尤其是英法德的关系。比如美国对德国大力扶持,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德国鲁尔工业区,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却触犯了英法和苏联的利益,并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法国战后初期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使得共产党势力日益强大,并一度有组阁的可能,然而法国为获取美援,法共不得不放弃组阁的机会,最后销声匿迹,法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苏联中止与法贸易谈判”^[10],这对当时经济困难的法

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英国为恢复经济,在战后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国营制度又为美国所看不惯,惟恐英国工党被赤化,被苏联拉去,因而利用英国自身经济困难对其进行压制,并迫使英国与美国站在同一反苏战线上,这让英国感到倍受煎熬,“能借给英国钱的是美国,美国正患着反苏狂热症。想借钱的自得投债主之所好,至少也不能惹债主的不高兴。英国在共和党势力中的美国国会中本来已是个不入眼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不顺着眼色‘反苏’一下,这笔款也不一定借得来”^{[4]117}。

不过,在费氏看来,美欧关系是微妙的,即便双方会因为暂时的利益问题而产生摩擦,但从长远看,以英法为首的西欧还是会追随美国的战略意图,因为欧洲需要美国的援助以恢复经济,而美国又需要一个稳定繁荣的欧洲来帮助其遏止苏联,扩展自己的战略空间。而最为关键的,是因为双方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传统文化上也有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正如费孝通在《美国人的性格》系列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对于欧洲具有很复杂而且矛盾的情感。这情感表现在历史上的是一连串反反复复,似乎没有一贯性的事迹”^[11]。

结论

费孝通在其晚年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主张,真诚希望不同的文化能够和谐共处这个世界,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来消解冷战思维,用“和谐”、“对话”取代“冲突”、“斗争”。应该说这一美好理想与他对方文化熟稔极具关联。兼具中西文化视野的他,深刻体会到处于异质文化背景中的国家、社会、民族各自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差异,而由这些差异所造成的矛盾和隔膜有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与矛盾,美苏冷战就是这种矛盾的典型体现。费孝通看到国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冲突所造成的,而文化冲突的产生正是缘于彼此的不了解。在费孝通看来,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并非是你死我活的绝对斗争,而更多的是在共存中谋发展,开放中求和谐,在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下转第100页)

(上接第 34 页)

宗教和不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匡正偏见,扩大共识,超越异同,进而共同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大同社会。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持久稳定的‘和而不同’才能出现”。^[12]费氏所构想的这一理想目标,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背景下,对于我们要构建的和谐世界,无疑富有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 [1]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2]张东荪.为中国问题忠告美国[J].观察,1947,2(20):22.

- [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三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五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5]费孝通.杜威入选与对华政策[J].观察,1948,4(19):4.
- [6]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 [7]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 [8]张东荪.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J].观察,1947,2(6):26.
- [9]牛军.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0]费孝通.莱茵河底的魏玛阴影[J].观察,1947,3(18):19.
- [11]费孝通.负了气出的门[J].观察,1947,2(22):12.
- [12]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苏 南)